

《磧砂藏》
隨函音義研究

譚 翠◎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磧砂藏》隨函音義研究 / 譚翠著.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 - 7 - 5161 - 2960 - 9

I. ①磧… II. ①譚… III. ①大藏經—語音—研究 IV. ①B941
②H1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55175 號

出 版 人 趙劍英
責任編輯 李炳青
責任校對 凌文超
責任印製 張漢林

出 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樓西大街甲 158 號 (郵編 100720)
網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國社科網 010 - 64070619
發 行 部 010 - 84083685
門 市 部 010 - 84029450
經 銷 新華書店及其他書店

印 刷 北京市大興區新魏印刷廠
裝 訂 廊坊市廣陽區廣增裝訂廠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張 33.5
插 頁 2
字 數 568 千字
定 價 88.00 圓

凡購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圖書,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本社聯繫調換
電話: 010 - 64009791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凡 例

一、本文所引《影印磧砂藏經》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以陝西本《磧砂藏》為底本影印而成的。該藏經雖以陝西本為底本，但其中補配了其他藏經，在徵引隨函音義和佛經經文時，一律簡稱為《磧砂藏》，不標明實際底本名稱。《磧砂藏》隨函音義和經文引文標注方式如下：出處中斜綫前的數字表示《影印磧砂藏》的冊數，斜綫後的數字代表頁數，小寫字母“a、b”分別代表上半頁和下半頁。如“(138/17a)”，指引文出自《影印磧砂藏經》的第138冊第17頁上半頁。

二、《大正新修大藏經》，簡稱《大正藏》。本文所引《大正藏》經文標注方式如下：出處中大寫字母“T”後面的數字代表《大正藏》的卷數，小寫字母“p”後面的數字代表頁碼，小寫字母“a、b、c”分別代表上、中、下三欄。《大正藏》校勘使用的別本主要有：南宋思溪藏（宋）、元大普宁寺藏（元）、明嘉興藏（明）、宮內省圖書寮本（宮）、正倉院聖語藏本（聖）、正倉院聖語藏本別寫（聖乙）等，本文引用《大正藏》校勘記時所說的宋、元、明、宮等即上揭相應版本的簡稱。

三、慧琳《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本文所引《慧琳音義》如無說明均為《大正藏》（第54冊）本。

四、本文引用敦煌文獻標明卷號。引用其他文獻資料，用頁下注的方式標注具體頁碼。

五、本文所引文獻如存在訛衍脫的情況，處理方式如下：訛字在原文後用“（）”標出正字；脫字據上下文或文意補出時外加“[]”；缺字用“□”表示。

六、為方便敘述和避免理解上的歧義，本文行文一律使用規範的繁體字。所引文獻中無關主旨的文字變體和訛字，一般改為相應的規範字。

目 錄

凡例	(1)
----------	-----

上 編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隨函音義和《磧砂藏》隨函音義	(3)
第二節 隨函音義的形態與特徵	(13)
第三節 隨函音義的研究方法	(19)
第二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概說	(36)
第一節 體例	(36)
第二節 內容特徵	(42)
第三節 存在的問題	(51)
第三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文獻學研究	(58)
第一節 從《磧砂藏》隨函音義看《可洪音義》 在宋元時代的流傳	(58)
第二節 《磧砂藏》中所見《內典隨函音疏》逸卷考	(68)
第三節 《磧砂藏》隨函音義對其他辭書的引用	(76)
第四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佛經校理	(101)
第一節 探尋異文成因	(101)
第二節 判定異文是非	(105)
第三節 匡正刊刻訛誤	(111)

第五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文字學研究	(117)
第一節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近代漢字研究	(117)
第二節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大型字典編纂	(131)
第六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音韻學研究	(148)
第一節 音切的來源	(148)
第二節 音切反映的語音特徵	(149)
第三節 認識和了解音切的意義	(163)
第七章 《磧砂藏》隨函音義與詞彙學研究	(165)
第一節 所收詞彙的特徵	(165)
第二節 複音詞構詞研究	(168)
第三節 詞義考釋	(181)
第四節 同義詞研究	(187)
結語	(197)

下編 《磧砂藏》隨函音義彙編

凡例	(201)
A	(202)
B	(207)
C	(226)
D	(251)
E	(264)
F	(268)
G	(276)
H	(286)
J	(299)
K	(322)
L	(335)

M	(349)
N	(360)
O	(367)
P	(369)
Q	(380)
R	(396)
S	(403)
T	(425)
W	(440)
X	(452)
Y	(472)
Z	(499)
参考文献	(520)
後記	(529)

上 編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隨函音義和《磧砂藏》隨函音義

一 隨函音義

(一) 什麼是隨函音義

研究隨函音義，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便是：什麼是隨函音義？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得對“音義”作出恰當的定義。

清代謝啓昆《小學考》卷四五下云：

音義爲解釋群經及子史之書，故諸家著錄不收入小學。然其訓詁反切，小學之精義具在於是，實可與專門著述互訂得失。且《通俗文》、《聲類》之屬，世無傳本者，散見於各書音義中至多，則音義者，小學之支流也。昔賢通小學以作音義，後世即音義以證小學，好古者必有取焉。^①

《漢語大詞典》“音義”條下云：

六朝以來注釋古書字音字義的一種著作體。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諸經及《老子》、《莊子》音義，陳第《屈宋古音義》等。^②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未見“音義”條，但該書“音義

① 謝啓昆：《小學考》，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568頁。

②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三卷本）“音義”條，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7394頁。

書”條云：

音義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古人爲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字或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這是中國古書中特有的一種體制。根據記載，漢魏之際就有了這種書……一部書因師承不同，可以有幾家爲之作音，或兼釋義。有的還照顧到字的正誤。這種書在傳統“小學”著作中獨成一類，與字書、韻書、訓詁書體例不同，所以一般稱爲“音義書”，或稱“書音”……佛教經典在北齊時也有人作音，到唐代有兩部最知名的音義書，一部是唐高宗時釋玄應所作的《衆經音義》，另一部是唐憲宗時釋慧琳所作的《一切經音義》。包容極富，爲研究古音古義的重要參考資料。^①

綜合各家說解及現存音義的基本情況，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音義”是中國傳統小學的一種著作體例，產生於漢魏之世，盛行於隋唐之際，式微於五代之後，至元明之後，其體幾亡。從功能而言，音義既能傳訓詁之旨，扶音聲之要，又能證各本之異同，考古義之得失；就範圍而論，既注解群經、史傳之世俗典籍，又訓釋經、律、論之佛藏經典。

那麼，什麼是“隨函”呢？這一問題則涉及“音義”體例的發展流變。于亭曾推測，“音義很可能經歷了一個附著於文本，並未單獨成篇的階段，可能就是以 S. 3663、S. 10、P. 2669 寫本中這類面貌隨注於文本上下。其後學另紙順序摘錄被注之字，抄撮標注的字音字義，匯爲一篇，命之曰‘某書音’，卷背之音注，則稱‘某書音隱’、‘音義隱’，如此成爲獨立單行的書音，形成異於常倫的體式。敦煌殘卷中尚存六朝隋唐之《禮記音》、《毛詩音》、《楚辭音》、《文選音》寫本，體例極簡，多隨文摘字，字目下面只出直音字或者反切上下字，間或有極簡短的義訓，可以窺見古制”^②。可見，“音義”最初很有可能經歷了隨文訓詁的階段，然後才逐漸發展到獨立單行的“書音”，至隋末唐初的陸德明《經典釋文》集前代之大成，成爲儒家經史音義的典範。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音義”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2 頁。

② 于亭：《論“音義體”及其流變》，《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年第 3 期，第 15 頁。

然而，佛教經典中的音義體例又是如何發展演變的呢？其實，它與上文所述的儒家經史“音義”有着相似的發展路徑。對此，黃耀堃認為佛經音義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隨文加注，不少正文裏面經常附注音義，如唐代菩提流志譯的《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等，其中在咒語裏面夾注了一些發音方法以及反切，有些還注上梵漢語義比較之類；二是一些專收音義的書，如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等；三是隨函音義，即附在每一卷（函）末的音義。第一類的音義在本質上與第三類沒有太大分別，就其形式而言，第三類可以說是第一類發展到第二類的“中間過體”^①。雖然第一類的音義也可稱為“隨函（卷）音義”，但經折裝流行之後，第三類卷末附載的形式更為普遍^②。據此，從體例上看，“隨函”即附著於佛經卷末或函末，它是佛經隨文加注的變體，是發展到佛經音義專書的過渡體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隨函音義的定義可以有如下表述：

隨函音義，是附著於佛經卷末或函末，對該卷（函）佛經中的字詞進行注音、辨字、校勘、釋義以方便佛經閱讀和理解的一類傳注體例。

（二）隨函音義的流傳與分布

弄清了什麼是隨函音義，下面我們就來探討一下佛經隨函音義的相關情況。其實，儘管佛經隨函音義不像佛經音義專書一樣，為歷代佛經目錄所記載，但實際上這種附加音義產生和發展由來已久，一直伴隨著佛經的流傳和刊刻。如上文所述，溯其源流，蓋因歷代佛典多為生僻字加注音義，附於卷品之後，便形成了此種音義形式。在早期佛經寫卷中就已見其端倪，如在敦煌文獻寫本佛經中就存有大量隨函音義，像斯 4151 號《諸星母陀羅尼經》卷末附有一行隨函音義，斯 4210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末亦附有兩行隨函音義，等等；歷代刊刻的大藏經中隨函音義亦十分常見，如應縣木塔發現的《遼藏》本《妙法蓮花經》第 5、13、16、18、19、20 號刻本卷末均附有隨函音義^③，現存的《磧砂藏》、《普寧藏》、《嘉興藏》等大藏經卷末亦普遍刻有音義，可見，佛經卷末附有隨函音義

① 黃耀堃：《磧砂藏隨函音義初探》，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音韻論叢》，齊魯書社 2004 年版，第 252 頁。

② 同上書，第 262 頁。

③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8、128、141、151、163 頁。

在佛教典籍中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那麼，這些數量眾多的隨函音義分布流傳情況如何呢？

目前所見存的用“隨函”稱名的音義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和行瑫《內典隨函音疏》，這些名稱的取義可能就是可洪和行瑫最初閱讀經卷便隨函附記，最後再彙錄成書。柳豫《紹興重雕大藏音序》云“昔瑫法師嘗著音釋，附於函末”，現今所存行瑫音義殘卷大多亦附於函末，據此可推測，行瑫《內典隨函音疏》極可能是先附於函末，然後才彙集成書的。可以說，上揭兩部音義是隨函音義的集大成之作，然而，在這兩部著作撰寫之前和完成之後，隨函音義的分布流傳情況又是如何呢？對此，我們有必要作一番全面的梳理。

如前所述，敦煌寫經附載有大量隨函音義^①，作為現今可見較早的漢文佛經材料，這些附載的音義資料可以幫助我們探討隨函音義的早期形態。如斯 4268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末附有音義兩行，斯 4283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殘卷末亦附有兩行音義，斯 4391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二殘卷末附有一行音義，其中斯 4268 號經音後有“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師義淨奉制於長安西明寺新譯并綴文正字”的譯經題記，根據《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的考證，長安三年為公元 703 年，這一年是《金光明最勝王經》譯經的年份，而且也是上揭經音產生的最早年代，但是上揭寫卷的題記有可能是傳抄者照抄，並非這個經本的實際抄寫年代；其根據伯 2274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七經文末的題記推斷，上揭經音的產生時間至遲當不晚於唐大中八年（854）；而斯 6691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音》則為另外一種形式，似乎晚於上述經音產生的時間，它大體是彙集經文各卷卷末已有的經音而成^②。

其實，不論上述音義產生於上述何時，體例如何，反映的應該為隨函音義的早期情形。音義體在隋唐之際達到了高峰，前已論及，佛經音義專書的集大成之作玄應《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玄應音義》）和慧琳《一切經音義》（以下簡稱《慧琳音義》）也在此間相繼問世，這或多或

① 參見張涌泉《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小學類佛經音義之屬》（第十、十一冊），中華書局 2008 年版。該兩冊已將現今可見敦煌寫經中的音義收錄並作出考釋，其中就包括有大量佛經隨函音義。

② 同上書，第 5324—5325 頁。

少都影響和促進了隨函音義的發展，因此隨函體音義的鴻篇之作《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以下簡稱《可洪音義》）由五代後晉僧人可洪撰寫完成，如上所述，我們認為其有可能最初為閱讀經卷便隨函附記，最後再彙錄成書，似乎也可以看作斯 6691 號《金光明最勝王經音》那樣彙集經文各卷卷末已有經音的一種發展。而與此同時，佛經經卷也逐漸由寫卷發展成為刻本，那麼，刻本佛經的卷末是否附有隨函音義，其發展演變又是如何呢？

北宋初年官方主持雕刻的《開寶藏》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刻本大藏經。可惜《開寶藏》現今全藏已佚，保存只有極少數殘卷。其卷末是否附有隨函音義，學界對此多有論述，主要觀點有以下兩種：一為高田時雄指出未聞《開寶藏》附有注音^①；一為黃耀堃根據《高麗藏》^②部分經卷卷末有隨函音義，從而推測“開寶藏”可能也有隨函音義^③。但迄今為止，學界對此還未形成定論，蓋因單憑現今可見的少量殘卷尚難以窺見其全貌。據我們調查，今《高麗藏》附有隨函音義的經卷主要集中在華嚴部以及《宗鏡錄》，如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和唐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每卷卷末均附有隨函音義。同樣以《開寶藏》為底本的《趙城金藏》部分經卷卷末亦附有隨函音義，如《法鏡經》、《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等。又據高田時雄介紹，日本大谷大學、增上寺和建仁寺所藏《高麗大藏經》初雕本中亦有附載《內典隨函音疏》作為隨函音義的現象^④。

另外，遼智光撰《新修龍龕手鏡序》曰：“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啓以隨函，郭迨但顯於人名，香嚴唯標於寺号，流傳歲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惋歎，不逢敏達，孰為編修？”^⑤竊以為句中“隨函”蓋指當時可見到的附於佛經卷

① [日] 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與行瑫〈隨函音疏〉》，載氏著《敦煌·民族·語言》，鍾翀等譯，中華書局 2005 年版，第 425—446 頁。該文原刊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報告》，1994 年 2 月。

② 文中的《高麗藏》指的是韓國東國大學校利用海印寺今存八萬一千余塊經版，也就是完成於十三世紀，學界稱之為《再刻高麗藏》版予以重印的《高麗大藏經》，特此說明，下不出注。

③ 黃耀堃：《磧砂藏隨函音義初探》，第 260—273 頁。

④ [日] 高田時雄：《可洪〈隨函錄〉與行瑫〈隨函音疏〉》，第 412 頁。

⑤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中華書局 1985 年版，第 3 頁。

末或函末的隨函音義，且《龍龕手鏡》中多次引用並參考了《隨函》的用例，如：

(1)《龍龕手鏡·人部》：“逵，《隨函》音達。”^①

(2)《龍龕手鏡·歹部》：“殉，《隨函》云：‘誤，合作朽，音朽，枯也。’又俗鉤、苟二音。”^②

(3)《龍龕手鏡·木部》：“櫪，《隨函》音宛，於遠反，爲衣入蓐也。”^③

可見行均撰寫《龍龕手鏡》時，佛經經卷附有隨函音義的現象非常普遍。又《房山石經》的遼金刻經部分公認爲是據《遼藏》印本刊刻，其中也有少數經卷偶爾附有隨函音義，如《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卷七^④、《大智度經論》卷七七末等便附有隨函音義^⑤。又韓國誠庵古書博物館藏守其藏本遼代刻經唐實又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平、潛、育字函經卷下都有隨函音義。又應縣木塔發現的《遼藏》第5、13、16、18、19、20等號的《妙法蓮花經》經卷卷末亦均附有隨函音義。據此推知，雖然行均所據底本與守其藏本、應縣木塔本不是同一部遼代藏經，但《遼藏》部分經卷附有隨函音義的推論應該可以成立。

既然《高麗藏》初雕本以及再雕本、《遼藏》和《趙城金藏》卷末皆有附載隨函音義的現象，那麼我們也有理由推測《開寶藏》部分經卷應附有隨函音義。而宋元時代在江南刻印的私版大藏經，如《崇寧藏》、《圓覺藏》、《磧砂藏》、《普寧藏》以及隨後刊刻的明代官版《永樂北藏》、私版《嘉興藏》等大藏經函末亦刻有音義^⑥。此外，歷代刊刻的一些單行本佛教典籍也附有隨函音義，如《四部叢刊初編》收錄的上海涵芬樓影印明汪道昆本《弘明集》、《廣弘明集》每一卷卷末均附有音義。但據我們調查，上述單行本佛教典籍附有的隨函音義與《永樂北藏》本對應經卷的隨函音義相同，推其原因，蓋因現今單行本佛教典籍一般源自某部佛教大藏經，故其所附隨函音義亦爲大藏經中相應經卷隨函音義的翻刻。

①（遼）釋行均：《龍龕手鏡》，第494頁。

② 同上書，第514頁。

③ 同上書，第381頁。

④ 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房山石經》，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3冊，第305頁。

⑤ 同上書，第16冊，第305頁。

⑥ 參見陳士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以上我們對隨函音義的分布情況作了一個簡要的回顧。從中可以看出，就整體而言，不論是早期的漢文寫本佛經還是作為佛教文獻彙總的漢文佛教大藏經，都存有大量的隨函音義；然而就個體而論，大藏經之間隨函音義的數量差異還是非常顯著的。由於《開寶藏》和《遼藏》現今全藏已佚，我們無法全面考察，但是通過比較《高麗藏》、《房山石經》、《趙城金藏》與《磧砂藏》、《永樂北藏》和《嘉興藏》，我們發現前者的隨函音義要遠遠少於後者，因此我們不禁產生這樣的疑問：前者中的某些隨函音義是不是刊刻時被刪去了？如果是的話，又是為什麼呢？竊以為前者應存在刊刻時將部分隨函音義刪除而未予刊刻的現象。如前所述，從早期寫本佛經開始，卷末附有隨函音義就十分普遍，尤其是自宋而後，隨函音義已成為刻本大藏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連一些善男信女發願刊刻的單行本經卷都附載有隨函音義。因此，這些藏經據以刊刻的底本必然附有大量隨函音義。至於為什麼遭到刪除，是刻工有意為之^①，還是主持雕版者為了節約人工和財力，抑或為了統一體例，暫時還不得而知，姑發此疑，以待後考。

二 《磧砂藏》隨函音義

《磧砂藏》，全稱《平江府磧砂延聖院大藏經》，又名《延聖禪院大藏經》、《延聖院本》、《延聖寺本》，因刻版地點在平江府陳湖中磧砂洲延聖院而得名，是南宋最後一部私刻大藏經。關於《磧砂藏》始刻的年代，目前學界尚未取得一致的認識^②，但基本都認為開雕於南宋末年，此後由於遭遇火災和戰亂，刻經事業曾一度中斷，至元代大德年間又重新恢復，

① 任繼愈在《關於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意義》中說：“如《房山雲居寺石經》（即《房山石經》）可謂善本，其中有些石刻佛經體現了《遼藏》的面貌，但其中也有刻工貪圖省工，出現許多上下不相連屬的‘一’字，從一般校勘原理看這與字形、字音、字義或上下的錯簡毫無關係，只是由於刻工按版計酬，為了省力，又能占滿版面，才出現了不應出現的許多‘一’字，漢字中只有一字筆劃最少，刻起來又省力，用來充字數最方便。”參見《任繼愈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頁。這段話從另一方面說明了刻工對佛經刊刻的影響，因此我們懷疑有些經卷後所附載的隨函音義，是刻工有意刪掉了。

② 陳士強認為《磧砂藏》始刻於南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參見陳士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卷》，第411頁；李際寧根據西大寺本《大般若經》卷一經卷，認為《磧砂藏》始刊於南宋嘉定九年（1216），參見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北京圖書館館刊》1998年第3期，第73頁。對此，我們更傾向於後者的觀點。

直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①，《磧砂藏》全藏刻成。現存全藏總計五百九十一函，用千字文“天”至“煩”編號。據呂澂統計，《磧砂藏》全藏收經一千五百十七部，六千三百二十八卷，而現行影印本則總計為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②。

今存《磧砂藏》刻本主要有以下五種：其一為陝西開元寺和臥龍寺本，即陝西本，現存於陝西省圖書館，合計五百九十一函，六千三百六十二卷；其二為山西太原崇善寺本，即崇善本，有五百六十二函，四千八百四十六卷；其三為北京大悲寺明代配鈔本五千三百四十八冊，即大悲本，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葛斯德東方書庫；其四為日本對馬宗氏舊藏四千五百四十八冊，今在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其五為北京柏林寺舊藏“兩千數百冊”，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即國圖本^③。除此之外，許多藏書單位和私人還收藏有該藏的零本，如日本奈良四大寺就有該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百九十六帖。

本文主要依據的是《影印宋磧砂藏經》（以下簡稱《磧砂藏》），該影印本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以陝西本《磧砂藏》為底本，藏內所缺的經典用《資福藏》、《普寧藏》、《永樂南藏》等補配而成，也是現今易得的影印刻本大藏經之一。

就版本和影響而言，呂澂曾對《磧砂藏》有如下評價：“《磧砂藏》開始是準備依照思溪圓覺禪院本寫刻的，中間一度停頓後，又參照元代普寧寺版大藏經續刻，因此，它和這兩種刻版有密切關係，可想而知。在全藏裏又配用妙嚴寺版《大般若經》和《大寶積經》另本，補充了管主八募刻的秘密經版，所以又和這些刻本的母版有其淵源（妙嚴寺刻般若等四大部是參照福州、思溪、普寧、磧砂和弘法五版的，管版從弘法寺藏經選出則又淵源於遼金刻經）。在宋、元各種大藏經刻版中再沒有像磧砂版這樣關係複雜的了。元末，經過了兵亂，南方各種大藏經都損失了，只剩磧砂版比較完全，明初洪武年間（1397年前後）刻成的《南藏》（初刻本）就純粹用它為底

① 《磧砂藏》的刻竟年代也有不同說法，但一般來說普遍認為是元至治二年（1322），參見陳士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經典卷》，第411頁；呂澂《磧砂版藏經》，載《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卷三，齊魯書社1991年版，第1464頁。

② 呂澂：《磧砂版藏經》，第1467頁。

③ 李際寧：《北京圖書館藏磧砂藏研究》，第70—73頁；黃耀堃《磧砂藏隨函音義初探》，第251頁。